

狩野直喜与 20 世纪 20 年代末 日本在华劫购汉籍活动

薛 明

内容摘要: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公开的战前外务省档案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馆藏文书中,有部分内容涉及 20 世纪 20 年代末日本外务省“出资”并主持,“京都学派”代表学者狩野直喜参与的对陈毅边疆史地类旧藏、以丛刊为主的天津陶湘藏书等“实用”汉籍的劫购活动。研究表明,上述活动不仅完全背离其标榜的共同探究东方文化渊源、谋求中日两国共同福祉的动人口号,更是一场在“和平”掩护下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严重伤害。

关键词:狩野直喜 “东方文化事业” 汉籍 陈毅 陶湘

晚清以降至“九一八”事变,中国古籍善本大规模流失海外,其中又以东流日本者为最大宗。近代汉籍东流,已知主要途径有五:(一)在华日人留学生以及来华游历日人的零散收购。如外务省官费留学生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常在北京琉璃厂来熏阁、隆福寺文奎堂等各大书肆搜罗中国古籍。(二)日本书贾有针对性的来华采购在本国有商业价值的古籍。如京都“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于清末民初频繁往来北京和东京两地,大量购进各种古籍字画。(三)部分中国书贾为商业利益,主动赴日兜售古籍。如来熏阁主人陈济川受日人邀请,先后四次赴日“展销”中国古籍。(四)日本大财阀趁中国衰弱之机劫购以宋版为代表的珍贵古籍。如 1907 年湖州陆心源“皕宋楼”珍版遭三菱岩崎氏劫购一案,对中国学界产生的巨大震动,严绍璦先生叹之为“二十世纪中国文献典籍被外人劫掠之重大惨祸”^①。(五)20 世纪 20 年代日本政府对华启动所谓“东方文化事业”后,利用“庚款”为各学术机构大规模收购中国私家藏书。其模式通常由外务省信任之某汉学“巨擘”遥为指导,驻华领事及在华留学生受命秘访中国各处藏书家中有出售愿望

^①严绍璦:《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283 页。

者。如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京所、台湾沦陷时期的所谓“台北帝国大学”先后成功对杭州徐氏“东海楼”和福州龚氏“乌石山房”藏书进行劫购^①。

事实上,除“东海楼”和“乌石山房”外,日本“汉学家”同官方势力合作对中国古籍进行整体劫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还有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购藏书家陈毅边疆史地类旧藏,以及东方文化学院京都所收购以丛刊为主的天津陶湘藏书^②。而后两个案例的背后,皆有日本近代汉学家、“京都学派”创始人狩野直喜的“阴影”存在。

本文主要利用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以收录明治维新至战败之间政府档案为特色的大型网络数据库 <https://www.jacar.go.jp/>)公开的相关外务省档案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馆藏文书,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20世纪20年代末狩野直喜参与的一系列日本政府在华劫购古籍活动进行详细梳理和研究。

一、狩野直喜其人

狩野直喜(1868-1947),肥后(今熊本县)人,字子温,号君山,又号半农人,日本近代著名中国史学者,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与内藤湖南、桑原鹭藏并称为“京都学派”三大创始人。他积极参与日本政府推动的“东方文化事业”,并担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首任所长。其政治倾向较为保守,喜以“儒臣”自居,曾多次进宫向昭和天皇讲授“孔孟之道”。同时,对清逊帝溥仪的遭遇十分同情,与罗振玉、王国维等遗老亦有深厚交谊。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又奉命撰写《关于在中国北方开展我文化工作的意见书》,为日军如何在沦陷区推行文化殖民出谋划策。其一生在中国古典文史哲领域著述颇丰,比较代表性的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文薈》《论语孟子研究》《中国小说戏曲史研究》等。

1900年,自东京大学汉文学科毕业不久的狩野直喜获外务省官费资助,赴中国留学。期间遭逢义和团运动,与同为留学生的服部宇之吉一道被困

①有关日本劫购杭州徐氏“东海楼”、福州龚氏“乌石山房”藏书的具体情形,可参考巴兆祥:《日本劫购徐则恂东海楼藏书始末考》,《文献》2008年第1期,第131-142页;方挺:《龚易图的藏书如何去了台湾》,《海峡都市报》(电子版)2013年11月21日第A60版。

②有关日本劫购陶湘藏书的先行研究,比较代表性的有高田时雄:《陶湘藏書購入始末》,《陶湘藏書購入関連資料》,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附属東アジア人文情報学研究センター2010年,第3-12页;巴兆祥:《日本秘密收购天津藏书家陶湘藏书述略》,《历史文献研究》第4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366-376页。

于日本公使馆^①。“获救”后的狩野不得不中断学业归国,于京都待命近一年后于1901年秋再度来华。1902年狩野旅居上海期间,曾与内藤湖南一同前往宁波鄞县“天一阁”考察。此为狩野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中国江南文士的私家藏书文化,令他留下深刻印象^②。

在治学方法上,狩野崇尚“乾嘉汉学”,而不好“宋明理学”。他认为从事人文科学研究,资料的收集必不可少,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各种图书的收集。因此,狩野早在官费留学生时代,尤其是第二次留学中国期间(1901—1903),即已注意交结中国南北文士,以获取对搜求各类古籍善本之有益信息。“东方文化事业”启动后,狩野更利用其委员身份频繁往来中、日两国间,“为公”之余于个人收藏亦颇有斩获。期间,他还积极对日本官费留学生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的在华活动进行干预和指导^③。

1947年狩野逝世后,毕生藏书悉归京都大学文学部,后者为之特别设立《狩野文库》。据说其中就有明崇祯刊本《玉夏斋传奇十种》等稀见之物。由于笔者手头暂缺关于狩野私人购书记录的一手资料^④,因此还无法对其个人藏书情况进行深入研究。

二、参与日本对华推行的所谓“东方文化事业”

为缓和“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民众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并进一步扩大在华影响力,日本政府效仿美、欧,利用部分“庚款”于1923年推出所谓“对支文化事业”。该“事业”主要对中国人赴日留学、中日两国学者的中国文化研究事业以及日本在华文教医疗机构提供经济援助。“事业”具体由外务省下属文化事业部负责,同时在华组织由中、日两国文化界人士共同参与的总

①服部宇之吉(1867—1939),日本近代中国哲学史家。陆奥二本松藩(今福岛县)藩士服部藤八郎第三子,东京大学文科大学毕业后赴中国、德国留学(在中国留学期间的日记后经其女整理,以《北京笼城日记》之名出版),清末“新政”期间曾受邀在京担任师范速成科总教习。归国后长期担任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主讲中国哲学史。1920年代与狩野直喜共同参与“东方文化事业”,1929年担任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所长。1933年又任“日满文化协会”理事。主要著述有《东洋伦理纲要》《儒教与现代思潮》《中国国民性与思想》等。

②狩野直喜:《読書纂余》,日本弘文堂书房,昭和22年,第257—258页。

③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等译:《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2002年,第11、31、99、127、134、203页。

④据苏枕书《关于京大附图所藏〈七经孟子考文〉写本》一文可知狩野有《半农书屋日记》(未刊)传世,参见《南方都市报》2016年4月10日第10版。

委员会。时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的狩野直喜被选为总委员会日方核心委员,而负总协调之责的“总务委员”则由有“中国通”之称的前驻汉口总领事瀨川浅之进担任^①。

1926年,日方将“事业”更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亦随之变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委员会更名后的首要任务,是以中日两国文化界合作的方式,筹划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及附属图书馆。翌年,以中日学界合作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为主要研究课题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京人文研”)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正式成立^②,名义上由元史学家柯劭忞担任总裁,研究员除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少数日人外,亦多聘请国内学者。至于附属图书馆筹备工作,则由日方代表狩野直喜和中方代表汤中共同负责。

1928年5月,日本为阻挠国民政府“二次北伐”统一中国,悍然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事件再度激起全国民众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极大愤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方代表纷纷登报发表《退出声明》,“北京人文研”事实上解体。翌年,取代北洋军阀的国民政府推行“革命外交”,要求日方无条件退还“庚款”。在此情形下,日本外务省终于彻底撕下共同探究东方文化渊源、谋求中日两国共同福祉的“伪装”,不顾中方代表的反对,单方面继续使用“东方文化事业”名义和“庚款”,组织部分日方代表先后设立“东方文化学院”东京所、京都所。所长则各由服部宇之吉、狩野直喜担任。

三、“北京人文研”收购藏书家陈毅边疆史地特藏

1930年,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鉴于国民政府拒绝官方层面合作,决定单方面在华重开“东方文化事业”,仍以总务委员瀨川浅之进常驻北平,“北京人文研”各项活动亦得以恢复。但与“济南惨案”前不同的是,研究所改以“任务委托”形式邀请柯劭忞、江翰和胡玉缙等中国学者继续参与《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之编纂。同时,狩野直喜担任图书筹备处“图书筹备总委员会委员”,任务是对筹备工作给予指导性意见。而具体的图书收集则由日方专门聘请的版本目录学专家徐森玉负责。此外,按照规定,狩野直喜须与服部宇

①瀨川浅之进(1862-?),足守藩(今冈山县)藩士瀨川绫之助长子。1883年被选为日本外务省官费留学生,来华留学。1886年进入外务省,历任日本驻汉口、厦门等地领事馆外交人员。1910年任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总领事。

②有关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成立经纬,可参见孙颖、徐冰:《“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的筹建始末——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之典型一例》,《求是学刊》2007年第5期,第137-142页。

之吉一年两次造访北平相关机构,协调各方事宜。

当时图书筹备处所采取的收集方法是:派遣数十人规模的调查员出入北平各大小书肆,粗略挑出一批物美价廉之书籍后,进行第一轮杀价;经筹备处评议员审查和精挑细选后,再进行第二轮杀价;最终书目及价格确定后,由徐森玉出面购买。1926年至1930年五年间,该图书筹备处购入书籍数目及花费金额,可参见下表1^①。

表 1

年度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上半年
册数	918	12,182	18,090	26,250	4,440
金额(银元)	1383.30	11867.12	25123.00	60000.00	23500.00
备注	目录类	一般图书	一般图书	一般图书及县志类	陈毅旧藏刊本类

由上表可知:(一)“济南惨案”后由于中方委员的集体退出,“北京人文研”不得不暂停编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但其附属图书馆的筹备工作依然持续,图书购入并未中断;(二)1930年上半年购进的陈毅刊本类藏书虽只区区四千餘册,但按单价计算,则是五年间所购其他图书的数倍,由此可见陈氏藏书的珍稀程度。

陈毅(1873-?),字士可,湖北黄陂人,清末民初藏书家、政治家。早年毕业于两湖书院,赴日考察归后受张之洞邀,为湖北师范学堂堂长。学部成立后在京任参事,又任图书馆纂修等职。民国后历任北洋政府驻乌里雅苏台佐理专员、库伦办事大员、西北筹边使、库乌科(布多)唐(努乌梁海)镇抚使等职。陈氏喜治中国边疆史地,与日本蒙古史学者那珂通世等人多有书信往返,互赠对方所需书目抄本^②。

《续修四库全书提要》主要编纂者伦明,在其所著《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对陈氏藏书之价值和遭遇作如下描述:

素治蒙古地理,当局采其虚誉,骤用为库伦都护使,遇变,仓促逃归^③,幸篋中书未失。书多地理类,尤多秘本,张殷斋《魏延昌地形志》不全稿,亦其一也。君歿,书散出。当事仆与某书店侵蚀其值,(此处疑脱一“不”字)过五分之三四,所得犹万餘金云。^④

①《10. 昭和五年七月 圖書籌備處概況報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档案号:H-0093。

②《陈毅致那珂通世的信(1902年)》,李庆编:《东瀛遗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稀见史料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1页。

③指1921年白俄进犯外蒙,陈率部抵抗不力,库伦陷落,遭免职一事。具体研究可参见樊明方:《陈毅在外蒙古》,《西域研究》2006年第1期,第21-28页。

④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第52-53页。

在“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向外务省递交的《图书筹备处概况报告》中,对陈氏藏书无论刊本、手抄本皆给予极高评价,并将之视作图书筹备处开张五年来最大成果。在这桩“成功”的收购案中,当时身为“图书筹备总委员会委员”的狩野直喜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1930年初,获悉陈氏藏书已大量流入北平古物市场的濂川浅之进去函狩野直喜,就是否应当由“图书筹备处”出面购买这批藏书,征求后者意见。狩野得信后,随即亲自致信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信中详述前清光绪末年自己同陈毅在北京的往来经过:当时自己仅为一来华留学后生,但有幸受邀赴陈宅,更得以纵览珍藏,乃知陈氏所藏历史类古籍中,有不少他人所无之罕见孤本。刺激之深,至今仍常挂念陈氏故去后其藏书之下落。此番得知筹备处欲购进该氏旧藏刊本,自然极为赞成。

不仅如此,狩野还在末尾特别提醒陈氏所藏手抄本(部分由陈毅亲笔抄写)中亦不少内容罕见之珍本,万不可遗漏,可分批先购进刊本,再进一步谋划收购手抄本^①。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最后接受了狩野给出的上述建议,在实际操作中,对陈氏藏书中的刊本和手抄本分两步进行购入。其中,对于日方购入陈毅手抄本的具体数目和金额,笔者尚未能查阅到相关资料。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时任“东方文化事业驻北平总务委员”桥川时雄鉴于中日关系难免进一步恶化,考虑从图书筹备处所存汉籍中挑出珍稀善本,以备未来一旦发生紧急状况,可迅速将上述图书转移至日本驻北平公使馆内。在获得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同意后,总委员会很快向东京方面提交了一份待转移书目。该书目列出善本书目总计269种。在此基础上又标注“优先转移”书目计58种,其中相当部分为中国边疆史地类稀见书目,如《藩部要略》《热河志》《元史地名考》以及《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可见当时日本学术界关注重点之所在。陈毅所藏张殷斋《魏延昌地形志》不全稿(计一函,内三册)亦赫然在列^②。

日本战败投降后,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派遣专员赴北平接收了包括“北京人文研”在内“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有在华财产。解放战争末期,上述财产部分被国民党运至台湾,后以之为基础建立“中研院史语所附属傅斯年图书馆”。剩餘则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继承。其中关于陈毅藏书的下落,究竟是在战争期间遭日本侵略者转移出国,还是同其他图书资料一齐由中方接收,尚需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①《15. 雑信 自昭和四年東方文化学院関係雑件》,档案号:H-0688。

②《昭和八年一月 総委員会善本圖書目録送付二関スル件》,档案号:H-0094。

四、劫购康有为愚园路藏书计划

1929年初,京都大学史学科教授矢野仁一逗留上海期间,有私立法科大学教授徐某怂恿其购买康有为“万木草堂”藏书。矢野归国后,将此事告知狩野直喜。狩野对康氏所藏清版书颇感兴趣,便请求外务省文化事业部指示驻沪总领事馆在当地展开调查,并推荐精通古籍鉴定的东亚同文书院教授小竹文夫一同参与^①。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早年讲学广州万木草堂期间,即注意多方搜罗中西书籍。归国后,又购得同乡孔氏岳雪楼旧藏总计数万册,其中除殿本《图书集成》外,亦不乏宋元珍本。其藏书处除上海愚园路寓所外,又有杭州西湖天游堂和青岛天游园两处^②。

1929年5月,日本驻沪总领事馆书记员岩村成允根据狩野提供的人名及住址信息,经过一番调查后得知:徐某教书之余,于法科大学附近开办一间书店,转让康有为藏书仅是受人所托,代为宣传以赚取佣金。徐某本人与康氏遗属并不相识,更不清楚藏书内容。且从徐某口中得知,康氏藏书中之清版似已售予安徽省。

正当调查活动陷入僵局之际,岩村偶然从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船津辰一郎口中得知:康有为之同乡故交汤哲知(生卒年不详)如今正为寻找康氏藏书买家而四处奔走,受托将书目分别寄送给日本“帝国图书馆”和大财阀大仓喜七郎。此后,岩村又从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处获悉,康氏藏书中以清版为佳,而宋元古版价值不大。

后经船津介绍,岩村见到汤哲知本人,后者对康氏藏书极为清楚。从汤氏口中得知,康有为藏书中之清版由马君武作中介,已售予广西省立图书馆,现仅存宋元古版及部分手抄本。康氏遗属因生活困窘,急欲将剩馀藏书转让他人。随由汤哲知领路,岩村与小竹文夫一道前去愚园路康宅,亲眼见到上述藏书。经鉴定,小竹认为其中“宋元古版少有可观者”,明版中虽部分有实用价值,但康氏遗属出价过高。

①小竹文夫(1900-1962),日本近代东洋学专家,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授。著有《近世中国经济史研究》《上海三十年》等书。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后,任所谓“中支占领地区图书接收委员会”委员,参与日军对江南地区的图书掠夺。值得一提的是,1929年,小竹还受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特别指派,参与东方文化学院东京所对杭州徐氏“东海楼”藏书的收购活动。

②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73-74页;李耀彬、蔡公天:《康有为藏书考》,《图书馆学研究》1987年第5期,第115-119页。

5月末,岩村将调查情形向狩野直喜作了详细汇报,后者在回函中表示:康氏藏书中宋、元古版不足为信,此点自己早有耳闻。其清版既已全部卖予他人,收购计划无奈只得作罢^①。至此,狩野放弃了以康氏藏书充实馆藏的方案。

五、京都所完整劫购天津陶湘汇刻藏书

尽管未能实现对康氏藏书之收购,但狩野直喜已确定下大致方针,即通过整体购买中国某藏书家所藏,建立起京都所汉籍馆藏之基础^②。而此番受狩野委托,秘密探听中国藏书家情报的,则是当时逗留北平的日本文部省驻外研究员、京都大学文学部助教仓石武四郎。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新潟高田市人,日本现代知名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1928年获日本文部省资助赴北京留学,归国后历任京都大学、东京大学教职,专攻音韵学。战后担任日中学院院长,长期致力于日本的现代汉语教育和推广。著有《中国留学记》《段懋堂的音韵学》等。

1929年6月,仓石前去拜访徐森玉,请求后者提供帮助。不出十日,徐氏即携带天津银行家陶湘的藏书目录回访仓石。

陶湘(1870-1940),字兰泉,号涉园,江苏武进(今属常州)人。民国知名藏书家、银行家。早年受同乡盛宣怀提携,历任京汉路机器厂总办、轮船招商局、汉冶萍煤矿董事等职。后长期寓居天津,曾任天津中国银行经理。业馀喜好藏书、刻书,雅号“涉园”,所收不重宋元古本,而以汲古阁、武英殿等明、清精刻本为主。

仓石阅毕书目后,惊叹陶氏藏书“网罗所有丛书、汇刻、全集,简直就是一部现成的汇刻书目,没有比它更适合研究所收藏的了”^③。但随即又担心陶氏乃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爱书家”,其藏书不仅大多精刻原印、一页不漏,甚至连存书的木箱(每只都带精美刻字)都无可挑剔,出让价格必定不会低廉。果然,不出数日徐森玉又来告知陶氏开价为现银三万元。得知报价

①《康有為ノ蔵書ノ件》,档案号:H-0803。

②《昭和四年五月端午节仓石武四郎致松浦嘉三郎书简》,转引自高田时雄编:《陶湘叢書購入関連資料》,第3-12页。

③《昭和四年五月端午节仓石武四郎致松浦嘉三郎书简》。

的仓石迅速去函京都,信中希望此次收购能吸取“海源阁”一案之教训^①,尽快说服外务省克服价格上的困难,甚至必要时可派人亲赴东京交涉,万不可错失此千载良机^②。

狩野收到仓石的报告及所附书目后,完全同意仓石就陶湘藏书对京都所图书筹备工作重要性之见解。7月1日,狩野亲自致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信中云:

敝所开张以来,虽时日尚浅,然事务渐次整顿,研究之基础亦已确立。前度听闻文化事业部欲购入叶德辉、康有为二先生所藏图书,并将之分配于东京、京都二所。由于种种分歧和阻碍之故,终未得实现,遗憾至极。现研究所开办,愈感书籍之必要。二所经常费用中,各列入图书费一万元,然一年购入书籍无多,令人忧心。倘若一次性购入某“收藏”,以此作为馆藏,可补经常费用之不足,实在是合适之举。

数日前,自文部省驻外研究员兼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仓石武二郎处获悉,有天津藏书家名陶湘者,现欲卖却部分所藏计五百九十五种。览送来之目录,所藏涉经史子集,且几乎网罗所有汇刻书目。又陶氏藏书以多精刻精勘本闻名,作为研究所收藏之物,尤为适当。据闻其价格为三万元,经中国某古书界通人评估后证实此绝非高价。不过运输上非用牢固木箱不可。再考虑到重量,搬运费估计亦不菲。还须

①山东聊城杨氏“海源阁”,由清道光年间进士杨以增(1787-1855)创建,历经数代,收藏颇丰,总计藏书二十馀万卷,其中宋元珍本逾万卷,与常熟“铁琴铜剑楼”、吴兴“皕宋楼”、杭州“八千卷楼”合称为清代四大藏书楼。仓石武二郎受东京研究所服部宇之吉之托,直接参与了对“海源阁”藏书的调查活动。1929年1月末,他致信服部,大意为自己所调查的十二部宋版书目录中《王摩诘集》《韦苏州集》等已售出,所余八部包含手续费售价为三万四千五百银元,但由于迫近年关,杨氏后人用钱孔急,故希望外务省方面能尽快确定交易方式。同年5月,濑川浅之进受文化事业部之命,再次对“海源阁”藏书进行调查。此时杨氏藏书中,日方感兴趣的宋版如《说苑》《新序》《管子》《荀子》等书皆已先后售出。而对上述调查结果,外务省相关决策人员可能认为宋版书过于昂贵,作为研究资料上的实用价值又有限,故并未实质性跟进,收购计划最终不了了之。《昭和四年五月 海源閣藏書出售に關し報告の件》、《葉氏藏書買収ノ件》,档案号:H-0904、H-0688。按:当时日方还同时计划收购湖南劣绅叶德辉(1864-1927)后人所持宋版藏书,但最终亦未能实现。因日文中杨和叶二字同音,故有部分海源阁档案混入叶氏档案之中。

②《昭和四年五月端午节仓石武二郎致松浦嘉三郎函》《昭和四年六月十三日仓石武二郎致松浦嘉三郎函》。

给予中间人谢仪,估计约占书价之一成。

总之,若错失如此“收藏”而为他人所夺,将为非常之憾事。还望当局认真审议购入之事。陶书目录送来本所后,曾抄写一份转寄服部理事长处,还请详览。若当局同意购入陶书,可否不将之作二分,而全部交付于京都所。就此事敝人已预先获东京服部所长之谅解,还望理解。

另就京都所建筑之事,亦有鄙见,近日将上京亲作陈述。购书之事若稍有迟缓,忧心(陶氏售书之事)于彼地早晚泄露,将生阻碍。匆匆暂书至此,还盼至急回覆。^①

狩野在未得到外务省正式同意之前,便已开始考虑运输费用等事,甚至借口所内建筑事务,欲亲往东京进行“攻关”,可见他对充实京都所馆藏一事的急迫程度,和对此次陶湘藏书的志在必得。值得注意的是,狩野还在信中特意向外务省声明他本人已预先同东京所的服部宇之吉达成谅解,希望同意只由京都所一家购入陶氏藏书。关于其中奥秘,有必要将此前东京所劫购杭州徐氏“东海楼”藏书一案作简要介绍。

1929年上半年,日本外务省得知浙江“东海藏书楼”徐氏后人有出让藏书意向后,一开始即属意由服部宇之吉负责的东京所出面购买。服部在看过《东海藏书楼书目》后,认为徐氏藏书尽管绝大多数只是普通汉籍,但仍有助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因而正式提出了购买申请。后经日本驻杭州总领事米内山庸夫与徐氏多番交涉,除真伪有争议的明正德本《十三经注疏》外,以收藏有大量中国地方志为特色的徐氏藏书四万馀卷最终以三万四千元成交。

令狩野不得不亲往东京游说外务省的理由,或许还有一个。据日本汉学家、早年曾与仓石武四郎同在北京留学的吉川幸次郎回忆,当年他恰好因病中断留学返回日本休养,期间他曾听闻京都所的老先生们愤恨外务省愿意花费四十万元建造西洋风格的豪华研究所,却在三万元购书款上十分不痛快^②。当时大多数日本人仍以为中国的古书取之不竭,随时都可购买,只有如仓石武四郎等平日实际接触北平古物市场的极少数日本留学生才深切感受到市面上待售的私家藏书已经“见底”。不仅如此,中国各地众多新成立的公立图书馆以保存古籍为目的,大量购入私家珍藏,而成为日本人的有力“对手”。例如,由于外务省官僚的颟顸,京都所未能在三万元基础上多获取一万元的预算,使得京都学派另一代表人物、中国思想史家小岛祐马欲乘

①《8. 昭和四年七月 陶湘藏書購入ニ関スル件》,档案号:H-0802。

②吉川幸次郎:《人文科学研究所東方部の漢籍と私》,《吉川幸次郎全集》第23卷,筑摩书房,1999年,第640页。

“东风”再购进傅增湘所藏清人文集之计划流产^①。

为帮助仓石武四郎弄清陶湘数万册藏书的确切信息，狩野直喜还特别派遣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生、日后成为知名东洋考古学家的水野清一前往中国。7月底，仓石和水野二人前往天津特别一区十号路陶宅进行现场调查。在将徐森玉先前提提供的书目与陶家实际藏书情况进行细致比对后，仓石列出如下清单^②：

经部《十三经注疏》以下三十八种二千一百七十六本
史部《二十四史》以下二十八种三千二百四十九本
子部《十子全书》以下二十七种一千七百四十二本
集部《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以下三十一一种一千四百八十六本
丛刊《儒学警悟》以下一百七十种八千八百八十九本
影仿《泽存堂五种》以下十一一种三百二十本
辑佚《玉函山房丛书》以下十种二百九十六本
郡邑（方志）《泾川丛书》以下十种二百九十六本
一姓《二程遗书》以下三十八种七百二十七本
一人《黄石斋经学九种》以下一百五十六种三千七百三十九本
地志《大清中外一统舆图》以下三十种二千三百六十一本
共五百七十四种二万六千九百九十八本

从上述清单不难看出，陶氏藏书经史子集类经典、丛刊类和个人诗文集各占三分之一。而在狩野看来，其中的丛刊类当属质量最高也是处于草创期的京都所迫切需要的。

在随后致京都方面的报告书中，可以看出仓石经过实际检点后，对陶氏藏书价值有更深刻的了解，他写道：

此汇刻（丛刊）乃陶氏四十年苦心收藏，就中若《指海二十集》《式训堂三集》《三影阁丛书》《袖堂全集》《洪氏传经堂丛书》《宋氏丛书十三种》，外间殆不见传本。尤以乾嘉诸儒之著述，经洪杨之乱烧毁殆尽，于学术上有稀见之价值，当不亚于价昂之宋元版。^③

由于先前提提供的书目与陶家实际藏书出现多处不一致的情况，仓石原

①《昭和四年七月十一日仓石武四郎致松浦嘉三郎函》。另据京都所购书登记可知该所
在1929、1930年通过东京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购进少量傅增湘旧藏。桥本秀美：
《“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展”东京会场纪事》，沈乃文主编：《版本目录学研究》
第二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②《8. 昭和四年七月 陶湘蔵書購入ニ関スル件》。

③《8. 昭和四年七月 陶湘蔵書購入ニ関スル件》。

先认为二、三日便可完成的检点工作实际拖延至一周,中途甚至不得不请徐森玉前来天津协调。而仓石始终怀抱“舍瓦砾,替之以珠玉”之野心,紧紧抓住陶湘身陷短时经济困难、急于将藏书脱手的弱点,成功要求后者同意以《校礼堂全集》《诗观三集》等十三种价值较高、但先前目录未载的古籍,替换《粤刻二十四史》《天都阁藏书》等十九种价值较低或虽目录有载、但未能在天津陶家检点到的古籍^①。

8月初,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致函狩野直喜,告以外务省同意购入陶氏藏书,相关手续已在进行之中^②。此后,日本外务省通过驻天津总领事馆,以现银三万一千元的价格购得陶湘在平、津两地近三万册藏书,并商定分批运输,首运占大头的天津部分。陶家只得其中三万元整数,而另外一千元则以“谢礼”名义由仓石转交徐森玉。

就在日方与陶湘交涉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爱国团体的不断请愿压力下,终于发布防止古籍流出国外的禁令。尽管上述禁令实际上在全国各海关并未得到严格执行,但时局的变化亦令买卖双方不得不格外小心谨慎。时任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致电驻天津总领事,指示后者在交易过程中切勿向中方提及“京都所”,在交易达成后可大致以“外务省委托天津总领馆代为购买”相告^③。而在陶湘一方,为避免可能来自国民政府的干涉,则将藏书假装抵押给友人周作民开办的、位于英租界的金城银行,并迅速存入该行下设的通成货栈^④。在最后的通关手续中,在日方“操作”下,共装了188只大木箱的陶氏藏书被假以驻北平公使馆发往东京外务省普通文书的名义,获得中国海关的免检资格,由日本三井洋行负责船运,从天津塘沽港顺利出境^⑤。

整个过程可以说与上半年东方文化学院东京所劫购“东海楼”藏书如出一辙。日本外务省表面上向陶家支付了三万元巨款,而实际上除书款外,包括保险费、通关费、运输费等后续费用皆来自“庚款”。几乎可以说,狩野直喜主持下的京都所是免费得到一座中国“丛刊”宝库。

陶湘藏书被秘密运至日本后,立即存入东方文化学院京都所。10月中旬,琉璃厂来熏阁主人陈济川应狩野直喜之请,带领两名熟练“做套工人”东渡日本。在工人为所有陶氏藏书重新更换封套后,狩野亲自以自己擅长的

①《昭和四年八月七日仓石武四郎致松浦嘉三郎函》。

②《8. 昭和四年七月 陶湘蔵書購入ニ関スル件》。

③《8. 昭和四年七月 陶湘蔵書購入ニ関スル件》。

④《昭和四年八月七日仓石武四郎致松浦嘉三郎函》。

⑤《8. 昭和四年七月 陶湘蔵書購入ニ関スル件》。

“翁同龢体”小楷在每部书的封脊上题名^①(如图1所示)。为近六百部汉籍工整题写书名,任务并不轻松,可见狩野对陶氏藏书的重视程度。同时,在狩野指导下,松浦嘉三郎等所内人员花费数月,将总计五百九十一一种(包括后寄的陶氏北平藏书)、二万七千八百六十三册藏书按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法制成《武进陶氏藏汇刻书目》,于翌年(1930)2月正式提交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归档备案^②。



图1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内馆藏的部分陶湘藏书,
封脊书名由狩野直喜亲笔书写

1931年春,外务省官费留学生吉川幸次郎学成归国,任职京都所研究员兼图书管理员。由于陶氏藏书以丛书汇刻为主之故,狩野直喜命其与仓石武四郎搭档,负责搜集重要汉籍的“单行本”。搜集标准与此前陶氏藏书相仿,即:(一)以清代考据学为主的实用书籍;(二)不求宋元珍版,但须精刻精印,不能有脱页漏页。二人以张之洞《书目问答》为参考,又陆续从北京来熏阁、文奎堂等处购进大量汉籍^③。

京都所以陶氏藏书为基础,在日本关西地区初步建立起一所颇具规模的汉籍图书馆。此后数十年间,京都所几经更迭,现为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陶湘藏书则由该所“东方学部”继承。

由于陶湘所售藏书多为清版或自刻丛刊,其中清版又有不少刻于光绪、宣

①吉川幸次郎:《人文科学研究所東方部の漢籍と私》,第640页。

②《8. 昭和四年七月 陶湘蔵書購入ニ関スル件》。

③吉川幸次郎:《人文科学研究所東方部の漢籍と私》,第641页。

统年间(如1899年广雅书局重刻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而在时人看来,前清末年之物还远算不得古籍,这或许也就可以理解后来有“国宝守护神”之称的徐森玉先生为何愿意在此交易中担当中介。亦因此,陶湘售书东瀛一事披露后,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太大反响。伦明只是可惜陶湘误将明版足本五百册《石仓(历代)诗选》杂入售出^①。藏书家董康甚至感慨京都所“为之永远储藏,不负兰泉廿年襁褓之苦”^②。然而随着时光流逝,至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乾隆年间刻本便可称作善本。如今,每年都有不少国内学者不远千里前往京都访查古籍。从此点上看,不得不承认当年狩野直喜的“远见卓识”。

六、余论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在日军铁蹄下迅速沦陷,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傅斯年、赵万里、袁同礼和刘半农等知名学者共同努力下,此前流于形式的防止古籍外输禁令作为文化知识界抗日之重要手段,得以真正实行。在保存古籍善本最多的北平,市政府依据《古物保存法》和“古物保存委员会”公文,指派公安局会同社会局严查琉璃厂文友堂、来薰阁和隆福寺文奎堂等素与日人往来密切、且于国难当头之际仍以利字为先,继续向日本寄送书籍之书肆。同时,又有爱国学生团体一面强行进入上述书肆仔细查账,一面蹲守于琉璃厂邮局外阻挠书商将书籍寄往日本^③。

相较于京都学派另一重要开创者、主动与日本军国主义合作的内藤湖南,国内学界以往对狩野直喜的评价可谓友善,有称赞其在日本全面侵华期间能激流勇退,为保持学术良心而辞去所长公职,亦有赞赏其敢于批评外务省强令学者进行“中国排日问题”之类出于纯粹实用目的之研究。然而,通过进一步挖掘史料表明,在二三十年代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日本,作为中国问题专家且与外务省关系密切的狩野直喜根本无法完全置身事外。他只是反对在对华文化侵略上的急功近利和暴力手段,而主张采取和平缓慢的渗透之道。实际上两种做法在性质上并无不同,其最终都要在

①《武进陶氏藏汇刻书目》中记载实际册数为六百三十八册。另《上海近代藏书记事诗》称:“(陶湘所藏)丛书574种27000册为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囊括而去,中有宋刊《百川学海》、明钞《儒学警悟》等珍秘之籍”,此说或与事实不符。据松浦嘉三郎等人整理的《武进陶氏藏汇刻书目》记载,《百川学海》为明刻本,《儒学警悟》则为陶氏自制的影印本。伦明:《辛亥以来藏书记事诗》,第56页;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记事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6-17页。

②董康著,王君南整理:《董康东游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35页。

③《古籍善本ヲ日本方面ニ禁售ニ関シ報告ノ件》,档案号:H-0804。

文化精神领域达到征服中国的目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狩野直喜奉命撰写《关于在中国北方开展我文化工作的意见书》一文,为日军如何在沦陷区推行文化殖民政策出谋划策。他在文中写道:

近来彼等受时势之影响,肤浅的政治理论、经济理论,甚至彼等尤为重视的仁义道德理论亦有曲解古典而附会妄说者。又有以狭隘的民族意识而附会历史以倡僻论者。此等学说鹜于空论,不仅于学术无益,其流弊极为有害于世道人心,于国交不利。如此现象于支那历代衰乱之际尤为显著,今日排日之远因莫不存于此。^①

可见,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狩野,不仅对“新文化运动”后中国知识界普遍受西方进步思潮影响之现状极为不满,更对中国学者试图通过重新解释古代经典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做法表示担忧,认为其将更加激化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而关于解决上述问题的对策,狩野主张可由日本“帮助”中国学术界重振他理想中纯粹的“学院式”学问——清朝乾嘉时代之学风。这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何狩野直喜在对中国古籍的选择上,不以宋、元珍本为先,而更看重如陈毅边疆史地类旧藏、以丛刊为主的陶湘藏书等对研究者而言较具实用价值的图书。

尽管历史已证明,像狩野那样冀望于从古籍中找到在思想文化上驯服中国人的良方是行不通的,但对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思潮兴起之际日本部分知识分子的动向,国人必须保持警惕。

【作者简介】薛明,常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近代中日关系史。

^①《支那北地ニ於ケル我文化工作ニ関スル意見書》,档案号:调-0743。中译文转引自刘岳兵:《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00页。